

分化与组合

——中国中产阶级研究

ZHONGGUO
ZHONGCHANJIECENG
YANJIU

陈义平 著



 广东人民出版社

GUANGDONG RENMIN CHUBANSHE

分化与组合

——中国中产阶层研究

ZHONGGUO
ZHONGCHANJIECENG
YANJIU

陈义平 著

 广东人民出版社

GUANGDONG RENMIN CHUBANSHE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分化与组合—中国中产阶级研究/陈义平著. —广州: 广东人民出版社, 2005. 3

ISBN 7-218-05044-1

I. 分... II. 陈... III. 中等资产阶级—研究—中国
IV. D663.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107748 号

出版发行	广东人民出版社
印 刷	广东广彩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850 毫米×1168 毫米 1/32
印 张	9.625
字 数	23 万字
版 次	2005 年 3 月第 1 版 2005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218-05044-1/D·598
定 价	25.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出版社(020-83795749)联系调换。

作者简介

陈义平，男，1964年12月生，湖北仙桃人。先后就读于复旦大学和南开大学，分别获法学硕士、经济学博士学位。从1992起，就职于广东省社会科学院社会与人口学研究所，2000年后任旅游研究所副所长。现为南京

大学社会学博士后、广东省人口学会副会长、广东省社会医学研究会副会长、广东省性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广东省妇女研究会常务理事、广东省人口专家委员会成员、《南方人口》杂志副主编、广东省社会科学院人口硕士生导师。

从1990年起，先后在《社会学研究》、《人口研究》、《中国人口科学》等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60多篇，出版著作（含合著）5部；参与或主持的国家、省级科研项目20多个。主要研究领域：人口社会学、经济社会学、性社会学等。

目 录

第一章 导论	1
第一节 选题的背景与意义	1
一、社会分层的理论背景与中国现实背景	1
二、中产阶层研究的意义	8
第二节 文献回顾	11
一、西方学者对中国社会分层的研究.....	11
二、中国学者对中国社会分层的研究.....	15
三、中国学者关于中产阶层的专门研究.....	22
第三节 研究思路和方法	25
一、“关系性”研究与“分配性”研究相结合.....	25
二、以现代化为研究的参照系.....	28
三、分析框架的确立.....	29
四、研究方法的综合运用.....	30
第四节 论文结构和主要观点	32
一、论文的结构与内容.....	32
二、论文的创新之处与不足.....	35
第二章 中产阶层理论与研究	37
第一节 马克思的预言	37
一、马克思社会分层理论.....	38
二、马克思关于中产阶层的预言.....	40
三、关于马克思阶级理论的论争.....	43

第二节 马克斯·韦伯的挑战	46
一、马克斯·韦伯的社会分层理论	47
二、马克斯·韦伯对马克思的挑战	49
第三节 米尔斯的白领论	52
一、新中产阶级的定义	53
二、美国社会阶层的变化与新中产阶级的崛起	53
三、新中产阶级的特点	56
第四节 新马克思主义分析学派与新韦伯主义分析学派	57
一、怀特的阶级理论与阶级分类法	58
二、高德索普的阶级理论与阶级分类法	62
三、两种学派关于新中产阶层的解释差异	66
第三章 中产阶层概念的界定方法	68
第一节 中产阶层概念的模糊性	69
一、概念的对等性问题	69
二、分层模式问题	71
三、定量标准问题	73
四、分析单位问题	75
第二节 关于操作化定义的界定方法	77
一、社会经济地位量表	77
二、声誉界定法	79
三、职业声望指数	81
四、主观方法	82
第三节 社会流动的量度方法	85
第四节 现代社会中产阶层的界定	89
一、阶层与阶级	89
二、西方中产阶层的界定	93
三、中国中产阶层的界定	95

第四章 国外中产阶层的演变过程与变化机制	104
第一节 西方中产阶层的发轫	104
一、美国模式	104
二、欧洲模式	107
第二节 西方中产阶层的演变及其特点	109
一、中产阶级主体由传统中产阶级向新中产阶级转变 ...	109
二、中产阶级由单一层次向多层次转变	111
三、中产阶级内部从两极分化向分化减缓转变	112
第三节 东亚国家中产阶级的发展与现状	114
一、东亚模式与中产阶级的发展	114
二、东亚中产阶级的现状分析	117
第四节 国外中产阶级演变的机制	121
一、工业化	121
二、城市化	125
三、科学技术革命	127
四、人力资本投资	128
五、现代企业制度	129
第五章 中国中产阶级形成的现状与特征	134
第一节 中国中产阶级的历史发展	134
一、中国历史上的中产阶级	134
二、“二元结构”中的“类中产阶级”	137
三、社会转型与中国中产阶级的兴起	140
第二节 中国中产阶级的发展现状	147
一、中国中产阶级总量测算	147
二、中国中产阶级结构分析	157
第三节 中国中产阶级形成的特征	170

一、以经济体制与所有制关系的变化为前提条件	170
二、新、旧中产阶级同步发展	172
三、中产阶级存在于不同的行业、职业和所有制之中	173
四、中产阶级呈现出很强的地域性	174
五、现阶段的中产阶级具有较强的不稳定性	175
六、相对而言具有良好的教育背景	175
七、求稳怕乱	176
八、具有较强的社会责任感	177
九、中产阶级是现代消费观念的引领者	177
第六章 中国中产阶级扩大的条件与机制	179
第一节 中产阶级扩大的重要性	180
一、中产阶级与中等收入者	180
二、扩大中产阶级的重要性	182
第二节 完善私有财产保护的法律制度	187
一、财产和财产权利	188
二、我国对私有财产的法律保护制度发展沿革	191
三、关于私有财产的两个理论问题	197
四、保护私有财产是中产阶级扩大的前提条件	199
第三节 最大限度减少农民数量	204
一、减少农民数量的理论依据	205
二、减少农民数量的可行性研究	209
第四节 建立公平公正的社会资源分配机制	214
一、社会资源分配的两种基本方式——再分配与市场	214
二、市场转型与中国社会资源分配方式的转变	216
三、社会资源分配的不公对中产阶级扩大的制约	218
四、中产阶级扩大过程中的社会资源分配机制	222
第五节 建立合理的社会流动机制	229

一、社会结构弹性——社会流动的前提	230
二、职业流动——社会流动的重要途径	234
三、教育——社会流动的重要手段	238
第六节 建立弱势群体的社会保障机制	243
一、社会转型期我国弱势群体的成因及特征	244
二、建立弱势群体的社会保障机制	247
第七章 中国中产阶层的扩大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	249
第一节 从“小康社会”到“全面小康社会”	249
一、小康社会	249
二、全面小康社会	252
三、全面小康社会与小康社会的区别	254
第二节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与扩大中产阶层的关系	256
一、相同点	256
二、不同点	259
三、两者的相互关系	261
第三节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过程中的阶层结构变动趋势	262
一、西方社会经济结构模式	262
二、不同经济体制下的社会结构	264
三、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过程中的阶层结构变动趋势	268
第四节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中中产阶层扩大的基本对策	270
一、把理论创新转变为制度创新,为扩大中产阶层 提供制度保证	270
二、把扩大中产阶层作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一项 政策选择	271
三、大力发展教育,促使低收入者向中等收入阶层转化	

发展	272
四、加快城镇化进程,最大限度减少农业劳动者阶层.....	273
五、放宽政策,给低收入阶层和贫困阶层“休养生息”.....	274
六、发展民营经济,培育企业家阶层.....	275
参考文献	277
后 记	297

第一章 导 论

第一节 选题的背景与意义

社会成员在社会分层结构中的位置变化，是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统计学、管理学等众多学科关注的一个重要领域。无论在何种形态的阶级社会中，社会成员都具有不同的经济利益、社会地位、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等，这些要素构成了人们在社会地位上的层级或等级差别。由相同社会地位的社会成员组成的社会集团称为阶层，阶层的存在根源于社会差别的存在。从历史上看，社会阶层的起源可以追溯到社会经济制度日趋复杂的时期，当农业比较繁荣，劳动产品出现剩余，而且社会出现分工或专业群体时，社会阶层也就随之而生。因为经济制度复杂程度的增加，通常与明确界定土地财产或产权关系相联系。从某种意义上说，如果社会没有划分出阶层，就意味着社会没有稳定的利益群体。

一、社会分层的理论背景与中国现实背景

(一) 阶级分析在二战后的发展

虽然“阶级”这一名词，在现代社会中已成为一个日常名词，但这一名词的产生并非一件偶然的事。根据英国著名学者雷蒙·威廉士（Raymond Williams）的考察，这一名词虽早在 16 世纪时已在英国出现，但直到 18 世纪末至 19 世纪初时，“阶级”

一词才具备现代的含义^①，它与工业革命及当时背景下整个社会的分化与重组有着密切关系。

阶级分析是西方学术界的一个研究传统^②。若要把阶级分析在二战后的发展历史作一介绍，我们大致上可把它分作三个阶段。

1. 低潮时期。

第一阶段由二战后开始一直到20世纪60年代初，可以说是阶级分析的低潮时期。在这段时间内，社会发展的理论可以说是以工业社会理论及功能学派为主流，而“阶级”这概念在这些理论中，只能扮演一些次要的角色。再加上战后西方经济迅速增长，踏入了一个所谓“富裕社会”（affluent society）的年代。当时流行的观点是，一切意识形态的争论，已成为没有意义的玄学，因为所有政治观点的差异，最后都能透过经济增长来解决（the end of ideology thesis）。在这种氛围下，作为一种分析工具，“阶级”这概念自然不能得到应有的重视。从工业社会理论的角度看，马克思的阶级理论即使能替早期资本主义社会把脉，亦已早被20世纪的“后资本主义社会”（post-capitalist society）的发展所淘汰^③。而在一般的实证研究中，“阶级”亦只被视作一连串的“社会经济地位指标”（socio-economic status indicators）。这些学者认为“阶级”一词意义模糊，理应把它拆解为不同的指标如职业、收入、学历、家庭背景、居住环境等，以

① Raymond Williams, *Keywords*, Glasgron: Fontana, 1976.

② 英国左翼学者密力班（R. Miliband）在20世纪80年代末期的一篇著作中，便一直为阶级分析辩护，并重申它在社会研究中的核心地位。见R. Miliband: *Class Analysis*, in A. Giddens and J. H. Turner (eds.), *Social Theory Today*. Oxford: Polity Press, 1987, pp. 325-346.

③ 在这问题上，最具代表性的著作是Dalf Dahrendorf: *Class and Class Conflict in Industrial Society*, London: R. K. P., 1959.

便进行量化研究。总之，这时期的阶级分析，可以归纳为以下两大类：一是描述性的研究，即把“阶级”量化之后再与其他“变项”（variables）作以相关性的研究，如犯罪率、离婚率、死亡率等；二是针对马克思理论体系关于中产阶层的预言进行批评。

2. 黄金时期。

第二阶段始自60年代中期，也可说是阶级分析的黄金时期。60年代社会的动荡和冲突，令“意识形态的终结”这个神话不攻自破。再加上“新左翼”（the New Left）运动之兴起，“阶级”便重新返回社会学的舞台上。不过，这“阶级的回归”与以往传统马克思学说有不同之处，因为他们一致认为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的确使得社会结构产生改变，以及意识到传统马克思主义学，并不能捕捉到后资本主义社会的社会形态。在这段期间内讨论的重点，似乎集中在如何重新界定阶级的边界问题上（the boundary problem）^①，即何谓“新工人阶级”、何谓“新中产阶级”、何谓“服务阶级”以及这些新兴阶级的政治取向等。可是，这批激进学者虽然成功地粉碎了以往“阶级消失的神话”（the myth of classlessness）^②，但仍未能对以上的问题达致一个共识。有关新中产阶级的问题，更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3. 困境时期。

到了20世纪80年代之后，阶级分析陷入困境。从认知的层

① 关于边界问题的讨论，较重要的文献包括：N. Poulantzas: *Classes in Contemporary Capitalism*, London: New Left Books, 1975; G. Carchedi: *On the Economic Identification of Social Classes*, London: P. K. P., 1977. ; E. O. Wright: *Class, Crisis and the State*, London: New Left Books, 1978. ; 等等。

② J. H. Westergaard: *Sociology: the Myth of Classlessness*, in R. Blackburn (ed), *Ideology in Social Science*, Glasgorn: Fontana, 1972.

面看，新马克思主义学者（neo-marxists），跟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学者一样，一直反对把阶级视为一个普通的变项，而坚持阶级是具有解释其他社会现象之能力的一种“媒介”（causal agent），可是这样又明显与事实不符，因为我们很难将一些社会行动（如妇女解放、环保等）直接归因于他们的阶级背景。新马克思主义学者唯一的出路，似乎只有把“生产模式”（mode of productions）抽离于个别社会之独特形态（social formation）而坚持阶级分析在资本主义生产模式内的核心地位，同时，又可能受到个别社会形态内之独特情形所左右^①。从政治实践的层面看，阶级分析也难以指引我们如何超越资本主义社会及其功利行为模式（utilitarian mode of action）^②，以至无论从哪一角度看，过分强调阶级分析的重要性均被批评作为一种约简倾向（class reductionism）^③。与20世纪50、60年代不同的是，现今批评阶级分析的主要还是一些激进学者。他们并不否定阶级的存在，甚至强

① 第一位系统解释“生产模式”和“社会形态”这两个概念的马克思主义学者是巴利巴（E. Balibar），但随之招致批评。见 E. Balibar: *The Basic Concepts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 in L. Althusser and E. Balibar (eds.), *Reading Capital*, London: New Left Books, 1970。相关之批评见 B. Hindess and p. Q. Hirst: *Mode of Production and Social Formation*, London: Macmillan, 1977。和 A. Cutlev, B. Hindess, p. Hirst and A. Hussain, *Marx's Capital and Capitalism Today*, Vol. I, London: R. K. p., 1977。

② 持此观点批判马克思主义说中的阶级分析的学者，既有马克思主义学者，也有非马克思主义学者。前者见 Jean J. Cohen: *Class and Civil Society: The Limits of Marxian Critical Theory*, 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 Press, 1982。后者见 David Lockwood: *The Weakest Link In the Chain? Some Comments on the Marxist Theory of Action*, in David Rose (ed.): *Social Stratification and Economic Change*, London: Hutchinson, 1988。

③ 对马克思主义说内之阶级约简倾向批判最烈的，还是左翼学者居多。见 Jean Cohen of cit, E. Laclau and C. Mouffe: *Hegemony and Socialist Strategy*, London: Verso, 1985; 及 Frank Cunningham: *Democratic Theory and Socialism*,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7。

调其重要性，而只是怀疑其核心性罢了。用挪威学者爱尔斯特（Jon Elster）的说法，是承认“阶级的重要性”（the relevance of class）并不等于接受“阶级的核心性”（the centrality of class）^①。

（二）改革开放与阶级分析或阶层分析在中国的兴起

事实上，有不少学者现在仍坚信阶级分析是（或应是）社会分析的核心问题；英国左翼学者密力班（R. Miliband）多年来一直主张这种观点。另一方面，近年来也有不少学者对阶级分析的重要性提出质疑。有趣的是，正当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日益摒弃阶级分析的同时，在中国 20 世纪 90 年代开始，兴起了研究阶级结构及社会分化的热潮。这种转变有几方面的原因，从国内讲，这虽然与国内学术开放的趋势以及借鉴西方学术界研究成果进行中国社会问题的“本土化”或“中国化”研究有关，但更重要的原因，应该是中国 20 多年来的经济改革开放政策所导致的国内社会分化和分层的急剧转变的现实所致。从国外讲，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一批国外研究中国问题的学者也把目光投向改革开放的中国，对国内的研究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②。

改革开放前，无论是从政治、经济地位，还是从社会地位来看，中国社会主要呈三级式的阶层结构，即干部、工人、农民三

^① Jon Elster: *Three Challenges to Class*, in John Roemer (ed), *Analytical Marxism*,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6.

^② 这一情况，涂肇庆、林益民主编《改革开放与中国社会——西方社会学文献述评》（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1999 年）一书和边燕杰主编《市场转型与社会分层——美国社会学者分析中国》（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 年）一书有详细论述。

个由高到低的等级^①。三者身份等级不同，与其相应的收入、声望和权力等也是不同的。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全部社会资源都控制在国家乃至中央政府手中，国家通过一系列制度性手段，如城乡分割的户籍身份制度、实行干部分级制度、资源分配的单位组织制度等，将所控制的社会资源分配至个人，从而形成对社会资源的占有，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个人不同的社会地位。每个社会成员在社会地位上的差异，首先体现在身份差异上，身份成了人们获得某种职业地位、享有某种社会资源、占有某种社会声望的基本前提条件。

改革开放后，随着计划经济体制逐步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一是所有制结构发生了变化，破除了公有制越“纯”越好的旧观念，首先确立了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新结构，不仅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和“三资”企业发展很快，而且在公有制经济改革的实践中，也出现了承包制、股份制、租赁制以及其他国有民营的经营形式。二是产业结构的调整，使得在社会劳动者构成中，第一产业从业人数比重不断下降，第二、三产业从业人数比重不断上升，并且大批农民进入城镇加入到第二、三产业大军中去。在这两方面要素的推动下，社会阶层不断分化，阶层结构日益多样化和复杂化。这种变化的显著特点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在城乡之间出现了一个占有一定生产资料的个

^① 按照我国学者的理解，改革开放前，中国社会呈现一种“三级格局”的固化社会阶层结构，从身份分层来看，全社会成员仅有干部、工人、农民之分。但事实上，还存在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右派、叛徒、特务、走资派、臭老九等群体。改革开放后通过“摘帽”改变身份，有的变成“社员”，特别是知识分子，被划成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但也有学者从阶级阶层的分析方法出发，认为改革开放前的中国社会是“两个阶级（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一个阶层（知识分子阶层）”。见陆学艺主编《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一书的前言以及郑杭生《我国社会阶层结构新变化的几个问题》（《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4期）一文。

体劳动者阶层和私营企业主阶层；第二，大批农民加入“农民工”群体，其中一部分进入乡镇企业成为乡镇企业工人，一部分进入农村和城镇个体私营企业成为雇工，一部分涌入城市的各种企业，成为城市农民工；第三，无论是原有的工人阶级，还是农民阶级，都出现了具有不同经济地位、社会地位，具有不同价值取向、归属感和认同感的社会阶层。也就是说，改革前以地域和户籍划分的市民和农民两大社会群体，日益分化为资本所有、就业性质、收入水平和社会地位不同的越来越多的社会阶层。

与现实相辉映，学术界也不甘落后。自1978年改革开放后中国社会结构的转型以及社会利益关系及其社会结构问题，始终为我国学者所关注，并成为研究的热点问题。由于社会利益结构在现实层面反映的是一个特定社会的最基本、最核心的社会关系及其制度性的演变，因而，这一研究热点亦成为当代众多学科最具攻坚性的难点^①。

具体到研究行为，从理论层面上，仍然以马克思（Karl Marx）和韦伯（Max Weber）的社会分层理论为基本的分析框架；从研究内容来看，逐步由描述层面向解释层面深化，并开始触及社会分层研究的方法论及其对相关研究理念的思考（张宛丽，1996；孙立平，1996；李路路，1999等）。另外，分层研究者，一般以现代中国社会结构两次重大的社会变迁（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和1978年开始至今的改革开放）为宏观研究时空，分析对象由这两次重大社会变迁的宏观结构分析，逐渐下移到微观“地位行动”研究，认识触角扩展和深化到“民间社会”地位行动及其分配规则。特别是关于阶级或阶层的划分，学者们

^① 我国学者张宛丽对此进行回顾和总结时也提到这一点。见张宛丽：《中国社会阶级阶层研究二十年》，《社会学研究》，2000年第1期。